

欧洲目前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政治家，市民，老板和员工——只有克服面前的挑战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

不幸的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功能缺陷和监管不利造成的金融危机现在依然存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欧盟需要果断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经济危机源自大西洋彼岸，它揭露出欧洲经济结构中已长期存在但是一直被忽视的弱点，因此，此次经济危机对欧洲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

这次经济危机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使欧洲开始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如同所有的变革，新的秩序将会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为了避免成为输家，欧洲必须要关注外部事务，并且在未来二十年内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改革计划。

欧盟领导必须继续采取措施来克服当前的危机，并且这些措施必须符合欧盟中长期改革的需要。

为了能在此次危机中全身而退，我们必须继续刺激经济，直到它能够恢复其功能。如果过早削减支出，经济复苏将会出现倒退。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要继续创造就业和增长。一些成员国已经支付不起昂贵的救援行动、上升的社会支出以及下降的收入来源，所以不得不依靠欧盟已经其他成员国率先建立经济复苏的条件。

如果欧盟想避免危机再次重演，就必须立刻进行功能改革以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现在，除了大幅降低贷款，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改变了其中一些导致金融危机的做法。

欧洲人将需要高度竞争的，可持续的社会市场经济才能维护社会凝聚力和对抗气候变化。

人力资本是保证全球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战略工具。然而，欧洲在知识经济的比赛中已经相当失利了。想要迎头赶上需要一致的努力。成员国必须充分调动已同意投资于研发的资源，接受私营企业的帮助，全面改革教育，包括职业培训。

欧洲人需要解决其人口挑战。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社会老龄化会给我们的养老，医疗和福利系统带来持续不断的压力，并且会破坏我们的经济竞争力。首要措施必须包含增加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更好的平衡工

作和生活；改革退休方式，使其成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发展一个更符合我们人口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积极的移民政策。

我们的公民希望欧盟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为，他们希望无论他们在欧盟何处，都能享受到他们的社会、公民、家庭和就业的权利。这样就保证了权利的可移植性，对公民来说，欧盟也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需要欧洲机构、经济和社会行动者紧密联合在一起；需要不同层次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例如国家、区域和地方。总的来说，这种情况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一种有能力与公民维持一个诚实和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建立伙伴关系的政治领导。确保得到公民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为了联合抵御危机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如果欧洲想在未来变得强大，也需要承担所需的结构改革。

欧盟不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它也是一个价值联盟。有了欧洲民众的支持，欧盟就可以全力应对重大全球性挑战。面对危机，如果欧盟领导人能够诚实告知民众未来挑战的规模并且号召民众一起努力面对，就如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欧洲带来繁荣的人们一样，民众将会重新坚定他们对欧盟的信念。

冷战结束后，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是惊人的。过去的二十年什么都没有完整保留下来：我们如何工作的，如何消费，如何旅行，如何相处，我们为何同情，所有让我们感到恐惧的问题全部被转化。这些变化大多数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系列动摇了我们信念和信仰的事件中最近发生的一件。在欧洲的近代史上第一次有了广泛性的恐惧，现在的孩子们将不如他们父母的一代。今天，我们生活在缺乏安全感的时代。

这种情况对欧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它也成为了二战后半欧大陆构成内部稳定、创造和平民主、促进繁荣发展的契机。同时，通过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它也给另一半欧大陆带来了契机。这种成功使得欧大陆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力量，拥有一个统一市场和自己的货币。然而，由于欧大陆人民进入到一个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战后年代，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一个共同目的。

欧盟过去的成就集中在自己的角落。在整合阶段，欧大陆的外部环境保持相对稳定。今天，欧大陆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快速的变化已经席卷全球。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世界中心将不再被传统的几大经济体所把控，世界的重心也将转移——向亚洲和南半球，向新的公共和私营部

门，向跨国机构转移。欧洲如今面对挑战和他们应对外部挑战一样，是在应对他们的胆怯。如果欧盟想确保未来的发展，它需要调整目标和政策来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如果过去的二十年已被破坏，那未来的二十年则更加令人不安。一个新的世界兴起了，权利更分散，国际动态更复杂。比起其主要竞争对手增长放缓，欧盟占全球财富的份额下降是不可避免的。欧盟的人力资本以其尖端的创新力和创造力长期支撑着欧盟的经济。但是，其他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在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的高水平投资。到 2030 年，亚洲预计将位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生产高价值商品，转变生产和整理生活质量。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国家的全面社会转型为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个 65 岁以上人口是在职工作人口两倍的老龄化社会，欧盟成员国需要大力资助他们的社会支柱体系，并且尽量延迟退休。由于内部供应劳动力和技术能力下降，欧洲急需吸引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我们实现社会管理一体化。最终，技术和通信的革命将会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及专业关系、带来新的伙伴、攻克更多的难关。

危机突显了大多数欧洲经济结构弱点：较低的生产率，结构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技能过时和增长缓慢。同时，在像中国，印度等国家，此次危机影响较小，他们的快速恢复将导致欧洲很多国家对于影响世界经济的迅速变化抱有乐观态度。

今天有人担心，新兴经济体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同时利用欧洲的结构弱点。事实上，经济输出趋势的变化是互利的，给投资水平，各方贸易和消费都带来增长。但是欧盟不能假定的认为“其它地区的崛起”将会带来双赢的局面。如果欧盟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需要，将会面临经济相对下降转化为绝对下降的危险。

拥有征服全球的野心不应该缩减国内改革或是远离它；没有国内经济坚实的增长以及整个欧盟的内部凝聚力，外部影响也是无法起作用的。但是，当前的时代已经果断成为全球化时代，这个转变创造了新的赢家和输家。如果我们不想站在输家的队伍中，我们就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过去不同，也需要有不同的反应。无论是相对人口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或者是能源短缺，挑战只有在区域和全球的大背景下才能够被正确的理解和解决。这是欧盟作为一个大大超过其成员国

总和的实体可以证明其价值之处。结合多层次的权力，从全局到局部，欧盟比任何一个符合二十一世纪需求的成员国都更有能力。

这并不会自动发生。即使欧盟享有必要的权力结构和政策工具，这些结构和工具仍需要由成员国正确利用。从根本上说，欧盟的共同议程归结为两个重要且完整的挑战：确保我们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随着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更新支持和维护这个模式的方法。

随着欧盟变成一个有能力的、精力充沛的全球玩家，它也需要将“团结”转移到欧盟项目的核心。团结不是无条件的去权利——这取决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像这样，它能够且必须在欧盟政策制定以及协调各方面关系时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这些关系包括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地域、区域以及国家的关系。

然而，欧洲民众仍然很难在欧盟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的使命是要分享，政策制定者和公民都需要对欧洲的风险负责任。

在欧洲共同体的核心是一个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基于通过社会端市场追求经济增长的理念，这种模式被公众广泛接受。它使得欧洲在二战后有很强了创造就业的潜力，允许一个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转变成成为强大的产业区和服务区。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这样完整的，结合在一起的团结、责任与竞争力。

然而，在新的国内和国际压力的背景下，这种模式需要重新定义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欧盟经济增长和工作增长的潜能，提高了生活水平的能力，都落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虽然它的一些成员国设法打破这个模式，但是整体形势一直持续到今天。通过揭示欧洲经济结构上的弱点，目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面对竞争力不断提高的新兴经济体和老牌发达经济体，欧盟必须实行新的大胆的改革计划，旨在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同时，周围存在模式的共识取决于持续的社会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平衡会被社会不平等的增长打破。对一些欧盟国家的公民来说，社会的排他性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依然是现实存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经济改革的结束。相反，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提高社会效益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使整个社会齐头并进方面。换句话说，欧洲

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我们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方面动态平衡的能力。

一个强大的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的特点是高生产率，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和在深化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专业化。这些发展影响工人和企业以及市场的运作，并且通过结构变化来影响公司管理。数字化提高了外包的范围，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可能会为未来几十年的生产率增长提供足够的空间。

对劳动力和企业的不必要的负担不能扼杀具有活力和创新力的服务。生产增长的同时，应该鼓励创业和风险承担。我们的愿景是：技术变革、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灵活性、竞争力和活力。

改革劳动力市场是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的重心。各成员国应旨在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的三个关键方面：员工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劳工流动性；企业文化以及管理实践。劳动力参与率也必须增加。

员工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是维持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劳动力的灵活性，需要有其对应的劳动保障。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工作是不需要被保护的，而是需要通过提高失业者的能力来保护他（她）。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掌握不断获取和适应的生产能力，并结合成员国之间的运输能力。

今天，对于工人和企业家获取和理解就业或创业的规则及方法，仍然是困难的。而“红头文件”不能制定超出范围的内容，它不应该是流动的障碍。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权，有并且永远应该在成员国之间是可移动的。在欧盟内部的资格认证需要保证和支持多语言。

最后，如果想要成功地努力于提升他们的劳动力的技能，在文化和企业管理实践上需要深远的变化。公司将需要更多的支持，这些支持体现在员工的主动性和开放式创新，以通过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提高竞争力。他们还需要培养一种企业内部归属感文化。

这个新的经济改革的推动必须伴随着新的有针对性的措施，目标在于加强个人的安全和团结。社会支持系统得到强大保护以防止滥用或道德风险。权力和权利必须用责任和义务来平衡。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应适应于快速融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长期支持工人的工作年龄。

同样，各成员国应投入足够的资源来对抗社会排斥、贫困和性别歧视。例如，通过，执行现有的欧盟立法确保商定的最低标准。

一个关键的关于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将对求职者和其他社会伙伴发挥作用。

通过在社会和税收政策领域里提供足够的协调，欧盟可以支持其成员国的能力，以追求社会目标，并按照他们的个人喜好又不造成竞争的扭曲或破坏单一市场。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社会基金应该充分利用同意在欧盟层面支持反贫困与社会凝聚力的目标。

欧盟还应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为一个健康的欧洲人口——至关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产——特别通过发展医疗保健、幸福和与年龄有关的行业服务。

最后，鉴于危机，商业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将通过其自身致力于在伦理、问责、社会和生态意识、反歧视、终身培训以及不断改善工作条件等诸多方面的自律来实现。

放任自流，这些趋势将加剧各种偏见，包括税收制度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成员国在解决不平等时遇到的困难。他们也会导致一个处在社会保护底层的种族并将加剧反对一体化。总之，经济五和社会发展维度将进入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要对抗这种不利的背景，重新启动并完成单一市场是不可能没有新的策略或交易前提下发生的。这样的交易应该包括承诺在规定的期限延长单一市场，因为这些地方仍然缺乏或者不够发达。第一且最重要的是，服务范围一定要包括金融部门。在衔接、社会和税收政策范围内，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整合，出于尊重欧盟竞争力的需要，这应该通过倡议来匹配。在同一时间内，努力走向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与增强社会包容性的措施齐头并进，特别是在关系到教育、就业、信息、健康和银行服务等方面。

基于知识和创意产业及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显著扩大的服务，正在成为就业和欧洲经济活力的中流砥柱。当年，欧盟的竞争优势可以用工资成本来衡量，那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智能、发明和创新已成为有关的基准。他们是欧洲未来繁荣的保障。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需要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也，越来越多的需要高价值的技能。

然而，欧洲正在技能竞赛中处在落后地位。在目前的投资趋势下，到2025年，亚洲可能会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列。这一优势主要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成本而言的。据估计，到那时，近一百万中国和印度学生留学

海外，将人才和经验的财富带回亚洲的家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欧洲学生留学欧洲以外的数量相对较少。

欧盟不能自满于面对这一趋势。在宏观上，更好的利用专业人才是确保个人和欧洲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向上流动的关键的战略工具。如果欧盟想实现知识社会的承诺，它必须在各阶段提供卓越的教育过程；根据其人口需要不断升级技术基础；并且创建一个社会、经济和受管理的环境，使研究、创造力和创新能够不断发展。

一个坚实的教育基础在小学和中学会对一个人的能力有巨大的影响，乃至影响生命的历程。太多的欧洲公民和第三国民生活在欧洲没有获得最高质量的教育系统。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解决这种情况，包括为教师提供他们应得专业认可，灵活的发展和开放的课程，以适应儿童的好奇心和创意培养；同时，加强公共教育系统、业务领域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同样地，在欧盟没有足够的一流大学，使欧洲缺乏对高素质的毕业生的吸引力。欧盟需要通过建立一个网络来改变这种情况。该网络是顶级高等教育机构，并且能够与是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媲美。追求卓越并不排除平行的努力以促进获取更多的大学教育，这样可以提高更广泛人群的平均教育水平。卓越需要临界质量和竞争，为学生、大学和学术研究带来一个公共空间。

大学的行政和财政自治也必须鼓励，这是增加私人投资高等教育最有效的方法。作为未来的受益者，收入高的学生应该有助于教育系统的建设成本。该成本包括奖学金和学生贷款，以提供给需要财政支持的学生。高校之间的竞争也必须提升，这也应基于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治理模式。

事实上，纠正供给与专业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要成为教育系统的最高优先级。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技能的升级以便让每个人准备就业的转换以及新技术和新技能的使用。实现此目标的必要前提，是将要实现一个灵活的，终身学习的文化。这样，每个人都能够在职业生涯的任何一点返回来接受教育。这些点与他们在年轻时的状况类似。“学习如何学习”必须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指导原则。

欧洲经常发现很难将科学研究转化为新的产品、新的专利、新的创业活动和新的工作。在服务市场缺乏竞争将导致抑制创新、成本提升和增长的极限。金融服务、下一代数字服务、能源解决方案以及促进健康和学习

的服务，都有巨大的潜力。欧盟已准备好成为一个领导者引领新的服务行业，但仅仅在当服务提供商是由欧洲市场支持，并且在一个新的监管环境下，创新和创造力可以蓬勃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所需要的措施到位这也同样是重要的。包括强化风险资本市场及种子资本可用性。特别的是中小企业，他们常常走在创新的前列，需要更充分的支持机制，包括获得风险资本，以帮助他们在全球市场竞争。

创意经济将继续比政治进程进化得更快。这些政治进程恰恰是为了支持和规范创意经济的。每一天，它揭示了新的视野和革命的前景。灵活性和反应因此必须成为任何在此领域中的监管框架的脊梁。促进一种创业和承担风险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这将允许欧盟完全获得研究和实验的回报，并用它创建新的工作。

综合人口老龄化和国内劳动力的减少，将对欧洲产生严重的后果。听之任之，它将转化为不可持续的压力，包括养老、健康和福利制度，同时导致经济增长和税收的负面效应。如果欧洲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包括迈向知识社会，努力提高经济效率和升级现有人口的技能，那么，必须辅之以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个人口挑战。不仅如此，它必须包括一个协调一致的努力使欧盟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没有移民，欧盟将无法解决未来的劳动和技能短缺。它也将看到一个普遍降低的现象，涵盖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实验、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和创新。

开始的时候，旨在稳定或增加生育水平的家庭友好政策应该到位。此外，通过提高生产力，可以部分抵消减少国内劳动力，包括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计划融资相关的问题的影响。生产力的稳步增长将允许修改资源配置，这可能有助于填补养老者和贡献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但随着欧洲的人口模式变得根深蒂固，这些措施的影响将严重不足。最后，欧盟的人口挑战只会通过两套互补作用被解决：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以及实现一个平衡、公平和积极的移民政策。

第二步将涉及拆迁法律、行政和文化障碍以促进欧盟内的劳动力流动。在这方面的关键策略，包括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完整可移植性的福利和养老金的权利、改进的语言训练、学位以及专业技能的充分认可，包括在所有的政治水平上发展一个真正的非歧视性的环境。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主要的转变是必需的，那就是我们的退休方法。目前提前退休的做法不应鼓励。对于个人，退休应该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项义务。工作年限应该在实际过程中加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也如是。

一般来说，欧洲有必要转变态度。移民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总是感到肩负重担而不是必须抓住机会。在这方面，欧洲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学习，并与他们在人才和技术移民方面直接竞争。向这些国家借鉴经验，欧盟需要制定共同的移民政策以吸引最优秀的、有才华和动机的移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人力资本回流到那些国家。

一旦在欧盟合法设立，移民应享受像欧盟国家公民同样的社会权利。现有的移民人口提高劳动力参与的潜力，应通过投资语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来充分挖掘，同时要结合制订反歧视策略。针对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的所有形式的歧视都应除去。

对于每年数万乃至数以百万计的第三国民依法跨越欧盟的外部边界，这也是在欧盟加强控制和验证机制的关键。这将确保迁移控制的负担不是单方面转移到欧盟的外部边界及保护他们的国家中。

如果欧盟想要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议程，它需要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者，从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角度让“赛车”在知识经济的轨道上运行，并为其公民提供自由与安全。岌岌可危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只有国际战略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由于权力从欧洲和美国转移，国际交往规则也已被重新定义。在这个动荡的形势下，欧盟再也不能蒙混过关。它需要成为一种驱动力以塑造全球治理新规则，或规避被抛弃的风险。作为一种推进策略，它也将需要主导构建一个国际环境，这将使欧盟可以推动其议程。

最后，欧洲一定要在竞争的世界里生存，它必须促进一个新的欧洲增长模型要素。该要素基于竞争力、包容性、社会责任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的其他玩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将按照自己的轨迹，使这一切更重要以帮助欧盟确定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操作模式。这将通过多边和双边会谈来实现。

在短期内，欧盟议程应该优先推广国际劳工组织的倡议，如全球性的社会板块或体面劳动议程。这将保证他们永远不离开市场开放的原则。它

也应该建立在坚实的承诺基础上：即用公平贸易来鼓励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作为对国际团结的一个重要贡献。。

欧洲公民表达了他们对欧盟承担更多责任的愿望。希望欧盟在全球舞台上，重视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有什么力量的来源是欧盟可以依靠用以执行这项任务的呢？成员国应该越来越明白，必须依靠欧盟作为一个功率倍增器，这有助于帮助实现他们所不能实现的目标。

然而，一个拥有 27 个成员国的欧盟汇集他们的主权以达成共同的决定，但却不是一个明显的全球性强势集团。事实上，欧盟在外交政策上的决定是采纳了共识的，可却被广泛视为一个障碍。欧盟的影响力取决于我们克服国家利益分歧的能力，这需要通过共同立场的形成而实现。因此，欧盟必须为了实现更大的协调而坚持我们的努力，从而实现以一个连贯的方式用一个声音说话，或至少让我们的各种声音和谐起来。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必须马上开始。行动要通过完善国家和欧盟政策之间的联动，以及成员国增加他们在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度来完成。通过共享国家的观点和经验，这些交流应具备多样性的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弱点。里斯本条约已经帮助在许多方面加强欧盟外交政策工具箱。例如，增强的合作程序，如果适度使用，可以作为一种姑息性以便在重要问题上保持分歧。新的欧洲对外行动服务（EEAS）应该充分开发并配备一个视图，以帮助欧盟找出其共同利益并产生共同政策，以便之后协调国家的地位。

然而，问题的根源是：欧盟在权法案地区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因其缺乏真正的共同工具（经济，贸易，发展援助，竞争政策），在该地区，原来的差距已经扩大：如外交和安全政策。相比于经济的总和及在欧盟处理的法律文书，其军事和政治手段弱多了。

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而言，欧盟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作为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替代模型和跨国法律共同体，除了冷热战争以外，还给一个以前四分五裂的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凝聚力。这种“软实力”是欧盟最大的资产。欧盟必须通过包容性和参与策略成为大陆枢纽。使用这些策略的巨大的成功，在欧盟持续地不断扩大。欧盟必须对来自欧洲的潜在的新成员保持开放，评估每个候选人自己的优点并与会员标准进行比较。这些都是事实上的“欧洲的真正局限”。按照这一参与和包容性的政策，欧盟必须对于目前的官方候选人信守承诺，包括土耳其，继续与其的谈判进

程。在同一时间里，应该提供与未来潜在候选人之间更加深入的协议。以此作为入盟谈判启动之前的一个中间阶段。

欧盟的吸引力必须也要保持其发展睦邻政策的核心要件。必须建立一个增强的作用机制以稳定周边。包括通过建立在现有的“欧洲睦邻政策”、“东部伙伴关系”、以及“地中海联盟”的基础上的关系。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应该用来创建一个区域性的民主空间、人权、发展和自由贸易。他们也应该提供与欧盟市场的公平接入并最终构造一个空间保障人的自由运动，保障欧盟及其伙伴的利益。此外，欧盟应该实施一种与俄罗斯的战略共存、现代化和区域建设的政策。

欧盟对外行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从现在起到 2030 年，能否适应它将面临的许多挑战的能力。因此，确保欧盟的经济实力与内部凝聚力，将是欧盟能够施加强大的外部影响力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当设计其外部位置时，其政策制定的过程不仅要由事件驱动。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的欧洲战略概念。

这个概念应该把欧盟的外交、军事、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其共同经济政策的外部尺寸合并。只有合并所有可用的工具，才使欧盟能作为一个变革力量，并有助于重塑全球治理规则。如同一张白色的纸，它会定期更新一样，战略的概念可以帮助定义欧盟的长期优先策略，并成为日常对外行动的参考框架。

通过建立一个欧洲的预测和分析单元，并作为欧盟对外行动服务的一部分且和国家中心密切合作地工作，在共享情报的原则下，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将有助于集中注意力于不断重新审视现行政策的需要。此外，欧洲外交学院将有助于形成一种常见的外交文化。

只有发展这样的战略方法应对其外部事务，欧盟才可以将巨大的财政努力（目前来说是全球最大的），更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它应该利用其结构优势追求智能发展和贸易政策。例如，欧盟应该追求支持在最贫穷的地区，减缓气候变化，那里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最严重，同时也至少对全球变暖作出了贡献。它还应该继续努力以“贸易掉贫困”，特别是通过农产品进口来实现。这就要求欧洲领导人在政治上作出艰难的决定，包括带给多哈回合一个结论。

使用欧盟的各种工具的策略也应该允许它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和人权更有效的促进者。一个让民主充分发挥作用并阻碍独裁政权滥用权力的制约性政策必须使用得更明智。这将需要保持与公民社会的合

作伙伴进行讨论，包括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不仅是政府的对话者；自下而上的干预支持世界各地的法律规则；和更一致的选举监督方法。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项治理日程必须形成最大程度地多边概念。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有必要建立一个欧盟的全球治理改革的作法。欧盟应该引导改革的努力使国际机构更加合理和有利于在其过程中推进自己利益的共同责任，这应包括简化和整合其表达方式，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论坛。只要单一欧盟的表达方式没有实现，在国际组织中的欧盟成员国代表应该提前协调立场并捍卫他们的一致性。